

“谁是青年”与“青年是谁”

——关于青年研究的几个问题

◎ 田 杰

摘要: 青年研究及其基础理论建设, 应从厘清“谁是青年”和“青年是谁”这两个问题入手, 不求构建那种主观的、封闭的庞大体系, 而应注重回归青年自身, 回归社会与青年的种种互动关联研究, 在一个开放的状态下, 在一个自然生成的过程中, 以高度的学术自觉, 吸纳和吸引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力量, 走一条“集约化”发展的路子, 逐步改变中国作为青年人口大国却是青年研究弱国的不合理局面。

关键词: 青年研究 科学化 学术自觉 集约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 D430 文献标识码: A

—

谁是青年? 提出这样的问题, 对青年研究来说, 似乎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 我们已经对青年的概念作出过若干的界定, 青年即应该是我们在已有的概念中所规定或符合我们所认可的青年概念的人。但是, 作为实际研究对象的青年, 并非具有以往我们所界定或认可的青年概念的全部特征, 至多只具有其某些方面的或最一般的特征, 所以, 在实际研究过程中, 仍然会面对“谁是青年”的问题, 需要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对“青年”的概念做出再次的界定, 如研究某一青年群体, 或群体中的某一亚群体, 以至再进入到亚群体内部的次级群体, 这时我们就必须回答“谁是青年”的问题。否则, 我们在研究中所运用的青年概念, 将是一个青年的抽象, 是一个概念的能指而非具体的所指。在现实的研究活动中, 这样的问题比较多, 如将对青年概念的一般理解应用到对不同青年群体的研究, 或将国外的青年概念简单地搬到国内的研究实践中。这是简单地套用青年概念, 而没有将一般的青年概念具体化或差异化, 将国外的青年概念本土化, 将本土的青年概念地域化, 将历史的概念时代化或现代化。许多大而无当的研究出现“指鹿为马”或青年不在场、缺位等情景, 实际上即是缺少一个对“谁是青年”的概念再界定过程。

我们或者还可以进一步再提出这样的问题: “青年是谁”? “青年是谁”与“谁是青年”并非同文互义式的文字游戏。前者我们要寻找的是青年本身, 是所有青年研究的一个大前提, 而后者要寻找的是青年中的一部分人, 是在进入某一具体的研究过程时所要回答的关于具体研究对象是谁的问题。 “青年是谁”的问题, 对研究者来说, 仍然是一个概念进一步再界定过

程,是建立起“青年”概念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特殊联系的过程;对社会来说,则与某种角色的赋予和期待相联系,其中隐含着诸多政治、经济、文化涵义,它可以是经济和市场活动中的一部分人力资源,可以是政治活动的中坚力量或生力军,可以是文化传统的破坏者和创新者,也可以是某项社会事业的继承者或接班人,等等,社会对“谁是青年”的回答总是充满丰富的想象力。那么,对青年人本身呢?这可能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人民(无论他们是谁’)在什么时候以及在什么地方把自己视为‘人民’,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很难回答的。”^①为什么会如此?因为无论是人民还是青年,首先都是一种社会权力赋予或期待的角色,而对于人民或青年本身来说,他们对于这种角色的认同会因时因地而异出现较大的变动和差别,在更多情况下,他们对于角色的理解和认同与他们的实际利益和权利诉求有直接关系。研究者、社会、青年本身对“青年是谁”的回答是不同的,这其中甚至会有许多断裂、矛盾和冲突。

“谁是青年”和“青年是谁”,涉及到青年研究本体论问题。在西方哲学传统中,“是”是本体论的核心范畴,本体论不是关于“本体”的学说而是关于“是”的学说,“所指的内容是以‘是’为其核心范畴的、逻辑地推论出来的范畴体系。”本体论是关于“是”而不是关于存在的哲学,因此它的使命不是关于存在的证明或关于存在的本质、本原、规律以及实在的最终本性的论证和证明。^②在这里不可能展开关于青年本体论研究问题的讨论,但我们基本可以认定这样的事实,即在关于“谁是青年”和“青年是谁”的判断中,需更注意其自身的逻辑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推演出有关青年的范畴或体系,而不要盲目、急躁地进入所谓本质或规律的探索,落入本质主义的陷阱,或主观臆想的规律泥潭。

本体论语言本来就是哲学家改造日常语言的结果,本体论语言的本质是以逻辑规定性作为其意义,以及由这些语言构成的“真理”所具有的逻辑的必然性。除此之外,任何所谓的科学或规范对本体论问题即使不是多余或不切实际的,一般也只能处于从属而非支配和决定性的地位。这又牵涉到方法论问题。以往我们的一些研究实践常常不是花相当的心思和精力去关注“是”及其本身所蕴涵的逻辑意义,而更多寄希望于所谓的科学方法,以方法替代逻辑,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方法论神话(早期这类问题更为明显,其理由之一即是社会科学之成其为科学是由其所运用的方法的科学性质所决定的)。实际上这里面有许多教条和误解。培根和笛卡儿建立的新的认识规则,将知识从一切价值判断中解放出来并使之只服从认识的合目的性,科学在摆脱了社会规则的束缚、社会压力的折磨的同时,也摆脱了常识和日常经验的平庸,现代科学获得了蓬勃发展的生机,但由此也造就了以科学和哲学为表征的新的上帝,即“哲学家和学者的上帝”。现代社会发展的经验证明,科学永远是社会的一部分而不能成为新的上帝。科学认识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的特殊性、自己的原理和规则,使自己成为一种客观的、普遍适用的认识。然而,在任何科学理论的核心部分都有一些形而上学的或意识形态的公设,都有一些范式,把科学认识与产生它的文化紧密联系起来,与它在其中诞生和巩固起来的历史联系起来。”在现代社会,一方面是科学认识越来越支配着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它越来越被纳入到政治、行政、社会、经济和技术之中,科学认识固然是越来越纯粹,越来越少功利性,越来越思辨,但同时也越来越具有操作性和操纵性,越来越受到操纵。”这是科学和社会之间的循环、矛盾和双重的对话。^③青年研究的科学化与学科化最重要的关节点不是某些或借用或独立的科学方法、概念、范畴等的确立和应用,甚至在整个过程中所谓的科学方法、概念、范畴等所起的作用都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重要的是研究者能够在中国现代性语境及与社会、青年的对话、沟通中真实而富有逻辑意义地回答“谁是青年”和“青年是谁”的问题,这是所谓青年本体论问题的第一道门槛,然后再进入“什么是

青年”的认识论论域,从而对青年一系列问题或论题做出比较科学、可信、有用的解释。

二

关于青年如何产生的问题有种种界说和论述,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引用西方传统社会学青年研究的观点,即现代大工业的兴起以及青年期的延长是现代意义上的青年群体产生的根本原因和条件。之所以在这里提及这一问题,一是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带有一定的根本性意义,对它的回答将影响一般研究的思路和问题指向;二是这种对青年发生的理解与中国的实际情况有较大差距。事实上青年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一个远比现代社会更久远的历史过程之中。为避免过多的历史纠缠,人们在研究中应用上述观点时往往会很巧妙地对问题进行限定,即一般多以“现代(社会学)意义的青年群体”来界说自己的对象所指。然而,做出如此的限定或界说也不足以将其做为一个带有普适性的关于青年发生的历史的或理论的推断。上述关于青年发生的观点明显带有西方中心论的痕迹,而事实上青年的发生即使在西方各国也大多是沿着不同的路径在不同的阶段中完成的,其中发挥作用的主要因素也有着明显的差异,如产业工人子女问题、青少年社会福利与法律制度、宗教青年社会团体、中产阶级的发展状况、国民教育发达程度、都市化和消费品的增长,等等。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乃至北美、日本等国家,现代青年的产生具有不同的涵义。这些国家青年的不同发生、发展经历直接影响其青年研究的问题指向,如英国更多也较早关注工人阶级子女的亚文化问题,在法国将中产阶级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对青年的影响作为重要内容,在德国则一直在思考青年的反文化和青年社会运动问题,美国则更注意现代都市生活和社会消费增长对青年的影响。在我国,关于青年发生的问题始终未能引起研究者的充分关注,许多研究直接套用前面提到的关于青年发生的西方社会学观点,这必然引致我们的青年研究在问题指向上比较集中于社会经济活动及其某些重大变化或决定因素方面,或者仍然不能走出单纯的青年为完成青年期过渡而受规训、磨塑、教育的历史窠臼。这种思维定势可能成为一种研究“范式”,^④历史在这里被简化,被模式化,被西方中心化的无意识所左右。

对青年研究者(乃至社会的一般理解)来说,青年与其说是历史地发生的,毋宁说是一种历史的发现。青年首先是客观的社会存在,然而,当青年成为社会和科学观照的对象,被纳入社会生活、社会活动和社会科学研究的视野,从而作为被意识到的社会存在,青年的性质将由此而发生重要变化。一旦青年的社会存在成为自觉意识,青年将成为一种具有主观能动作用的现实的社会力量。无论是青年成为被意识到的社会存在,还是青年形成社会的自觉意识以及青年关于自身的自我意识,这都是一种发现,即社会发现了青年,青年也发现了自己。

青年研究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之一是在历史中发现青年,在青年中发现历史。卢梭把儿童看作有自己的生命、理性和概念的人儿童尽管可以没有得到发展,但教师一定要理解和同情儿童的生活,以尊重的态度对待儿童。卢梭的这一观点启发了历史学的思考:这种概念应用到历史学上就意味着,历史学家一定不要做启蒙运动历史学家所经常在做的事,那就是以鄙视和厌恶的态度去看待以往的时代;历史学家必须以同情的态度看待它们,并在其中发见真正的可贵的人类成就的表现。”^⑤在历史中发现青年,对一个研究者来说,首先意味着在尊重青年的同时尊重历史,开阔历史的视野而祛除以往的历史偏见,在历史中发现青年的存在及其所表现出的“可贵的人类成就”,就是要善于从青年的角度去观察、思考历史,这可以认为是一种研究“范式”。历史进程波谲云诡,史学著述汗牛充栋,但是,关于青年的内容却不多

见,而有关青年的专门记载则更是凤毛麟角。其原因,除青年社会历史地位的客观原因外,以往人们缺乏一种观察世界的“青年”的视角,青年并未真正成为被意识到的社会存在,应该是主观方面的重要原因之一。按史学家的说法,没有被叙述的历史不是历史。而某些历史过程或历史现象之所以没有被叙述,是因为它们没有被历史所关注,因而自然也就不会被记载。所以,关注青年,形成观察社会的独特的“青年”视角,是在历史中发现青年的重要前提。有了这个前提,我们会在现实社会生活和过去的历史中不断作出关于青年的发现——发现青年在客观社会历史进程,特别是在重大社会变迁和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重大作用和影响,发现青年作为被意识到的社会存在的重要价值和意义,真正实现社会的青年认同,这对青年的社会认同无疑也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⑥可以说,没有社会对青年的热情关注和积极认可,社会在历史进程中不能真正意识到青年的存在,因而青年与社会的冲突将是不可避免和难以调和的,青年对社会的叛逆和反抗亦将愈益加剧。

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青年是作为附属或从属的社会群体而存在的。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以往的史学研究认为,附属群体没有任何自主独立叙述历史的可能性,所以附属群体没有历史。这种看法显然并不全面。附属群体的社会地位和史学价值固然长期为人们所忽视以至鄙夷,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群体的历史完全为人所忘记或遗弃。更多的情况下,这部分人的历史是“嵌入式”地被叙述和表达的,即青年人的历史通常是在其他历史叙述中被记载,是嵌入在其他历史叙述之中的,例如在有关古代生活史的记载中会发现,青年组织在古罗马帝国的希腊人中很普遍,在说拉丁语的民族中也存在;青年骚乱在当时时有发生,青年人将街头闹事称为自己的权利;男性青年青春期放纵的性行为得到社会风俗的认可并被年轻人视为自己的特权,等等。而在有关教育、民俗、家庭史、文学艺术作品、传记、笔记、书信、法律文书和判例档案等有关资料和记载中,甚至可以说,有关青年的历史记述是非常之生动和丰富的。但这部分历史需要挖掘和整理,需要钩沉辑佚的功夫,更需要去发现它的价值和意义。按有的研究者的说法,历史的“事实”并不是被发现的,而是在人们生产意义的过程中被建构出来的。在研究青年中,发现、建构青年的历史,使“嵌入”在其他历史文本中的青年凸现出来并成为一种新的文本表征,无论对青年研究还是对青年本身,都是有价值的。

在以往的历史中发现青年,从史学的意义上讲,是对历史进行新的建构的“构造性的历史学”,“是在我们从权威们那里所引用来的陈述之间插入另一些它们所蕴含着的陈述”,是历史学家发挥他的历史想象力,“沟通了权威们所告诉我们的东西之间的裂隙,赋给了历史的叙述或描写以它的连续性。”^⑦在青年中发现历史,也是历史的再发现。在我们从历史中发现的青年的身上,将折射出那段历史的新的色彩和新的意蕴。在历史中发现青年,不仅对于青年研究,也具有史学的重要意义。

在历史中发现青年,与在青年中发现历史,应该是紧密联系而非绝然分开的,或者也可以说,这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侧面。历史的发现在一定意义上亦即发现历史。历史的发现不仅仅是某些史实的发现,更重要的是意义和价值的发现,正是在这意义上,一切历史才被看作是思想的历史。如果我们的研究者真正能够从浩瀚的历史海洋中捕捉到青年的身影,那么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便不难发现和理解青年对于历史进程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反过来,当我们已经习惯于以历史的眼光去对待现实生活中青年的种种现象和问题时,我们对历史上的青年亦将不会再感到那么陌生或难以寻觅。历史的思维是一种想象的活动,……我们是用现在作为它自己过去的证据而做到这一点的。每个现在都有它自己的过去,而任何对过去的想象的重建其目的都在于重建这个现在的过去,——即正在其中进行着想象的活动的这个现

在的过去，——正像这个现在在此时此地被知觉到的那样。”^⑥历史与现在通过思维的想象和创造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人们提供对于过去的现在的理解和关于现在的历史解读。

在青年研究中，应该是历史地与逻辑地相统一。有研究者提出“青年研究缺什么”的问题。就目前我国青年研究来说，最缺的是“历史”。我们现在还没有自己的青年史，甚至还没有类似“青年与历史”这样的专门著述。^⑦因此，我们许多现实青年问题的研究还不能进行纵向的历史比较，难以找寻其历史的发展脉络。在一些研究中将中国青年与国外青年进行横向比较，这固然是必要的，但中国青年毕竟不是“生活在别处”，更不是生活在国外，因此这种比较一则其可比性需慎重对待，二则也实属我们自身缺乏“历史”而造成的一种无奈。中国青年的历史发现和历史建构，是目前或将来一段时期内需要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

三

如果说“谁是青年”关涉到青年研究中的本体论问题的话，那么青年与历史的问题则关系到对青年主体性的某些理解。这两方面的问题对青年研究来说，带有一定的基础性质，可能影响到我们对一些基本概念、范畴的理解和运用，也会对我们的思维方式、理论预设、价值取向以至于研究方法的选择、学科建设的方向等产生一定的影响。

我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无论在本体论还是关于人的主体性研究方面，较之以往已有重大的发展和进步，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将本体论作为“是论”而非本质论的理解，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同时更注重现实社会生活中人的发展而不是一种抽象的人性，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主体-发展性以及在现代性语境中突出认同的意义（即主体身份的自我建构和社会建构的一致性），史学方面对社会史、生活史、大众文化史等新领域的重视和开拓。这些无疑将对青年研究及其学科发展起到良好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在研究对象方面，目前我国青年处于历史上最活跃的时期，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加速、消费社会与大众文化的兴起、民主政治元素的增加和公民意识、权利意识的增强、传统意识形态逐渐退出普通公众的日常生活领域，这些变化对青年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大量的青年社会问题也相继涌现出来，教育、就业、婚恋、流动、犯罪等问题不仅在严重困扰社会也严重困扰青年本身。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社会中的一个全新的青年群体，青年研究要对这个群体及其所反映出的种种现象和问题作出说明和解释。我国青年研究有着十分强劲的“内需”作为它的发展空间和动力。目前我们的青年研究还难以满足这种“内需”。过去二十几年的发展为今天的青年研究积累了一定的研究力量和研究成果，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比较，无论在研究队伍、研究路径、选题方向、成果形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对所存在的问题，一般认为主要有研究力量分散，缺少协调机制；学术评价缺位，学科地位模糊；自发性质突出，后续成长乏力；学界关注较少，未登大雅之堂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出我国青年研究所存在和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但是，从某些意见本身来思考，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

首先，学科化焦虑问题。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青年研究在新时期的起步阶段，就很快提出其学科化建设和形成独立的科学体系的学科发展目标，并就此而在一定范围内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和论证。青年社会学是否可以或应该作为青年研究的学科归宿？青年学如何成其为可能？关于青年的研究怎样成为独立的科学体系？当时的争论肯定和否定的意见可以说不分伯仲，其中的有些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仍不失其学术价值。在争论的同时，研究的实践也取得了比较可观的成果，至今面世的诸如青年社会学、青年人类学、青年文化学、青年

学、青年运动史、学生运动史、青年社会思潮研究等基础研究著作,大多是在那一阶段完成的。这段时间青年研究的学科关注和学科成就,与当时国家大的学术背景有关,当时正处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恢复期,如同城市建设一样,旧城改造和新区规划同时上马,新建筑物遍地崛起,尽管其中有许多类似上海石库门改造后留下的那种“老年人感到它很怀旧,青年人感到它很时尚,外国人感到它很中国,中国人感到它很洋气”的东西。但青年研究其后的发展,却是很快恢复了冷静(有的说是沉默),学科建设的话语几近消逝,尽管研究并未中断。回头检视这近二十来年的研究成果,可以肯定地说在学术质量上有很大的提高和进步,“青年学”登上国家专业学科目录具有相当的象征寓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硕士和博士生培养的研究选题中不时可以发现有关青年的内容(新出版的一些青年研究——准确说应是在其他专业学科领域中进行的有关青年的研究——的学术著作多为博士论文修改而成,如桑兵的《晚晴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程巍的《中产阶级的孩子们》、陈映芳的《在角色与非角色之间——中国的青年文化》、韩晓燕的《中国离婚单亲家庭青少年的需要》、刘广涛的《百年青春档案——20世纪中国小说中的青春主题研究》、张国庆的《“垮掉的一代”与中国当代文学》等)。青年研究(如果不局限于某一狭小的范围)的学术质量和学科化水平有显著提高应是不争的事实。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青年研究已经走过经验描述期而进入到形成独立学科的发展阶段,或已经处在一个从经验型研究范式转变到专业化研究范式的转型期?如果就此作出肯定的回答恐怕还不十分容易。实际上,我国目前的青年研究尽管取得了比较可喜的成就,但在研究成果上仍然可以用“捉襟见肘”来比喻,这可以用至今我们还没有一套象样的青年研究(非通俗读物)丛书出版来证明,国外研究成果的翻译出版也相当零碎散乱不成系统。对一些重大的研究课题和研究领域,如中国的文化传统与青年、中国的百年革命与青年、中国的家族制度与青年、青年与现代性问题、青年的社会史和生活史等,青年研究至今还没有真正涉及到。所以,在目前状况下,应该更多关注和思考的还是如何打开青年研究的学术视野,拓展学术领域,促进青年研究在相关学科中的孕育和孵化,如果有可能的话则是进一步协调、组织相关学科的学术力量,共同策划和落实有关青年的专题学术研究。

近年来,关于青年研究学科化建设的声音又再次响起,这种对学科发展的关注固然是好事,但是,脱离我国青年研究的历史和现实,片面或不切实际地强调所谓的“独特的方法和理论”、“独立的理论体系和方法”、“形成科学而严密的整体结构”、“自己的概念、范畴”,试图以此作为登上学术殿堂的阶梯,只能是无益于青年研究发展的空泛议论(甚至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相比都是一种退步,因为那一时期学科讨论与研究实践是同步进行的,尽管二者都显得十分幼稚和不成熟),或者,作为一种无谓的自我焦虑而困扰研究者自己。学术要有自觉,学术需要勇气,学术要对学术本身负责任,但通往学术殿堂的永远是一条黑色之路——所以,更需要耐心和沉得住气。如果说困惑是对已知的迷惘的话,那么焦虑则是对未知的恐惧,是对前景的不可测表现出的一种浮躁和担忧。青年研究的学科焦虑,即是一种对于青年研究能否修成正果登上学术殿堂的一种前景性焦虑。要摆脱这种焦虑,最需要的就是静下心来潜心研究实际问题。从学术发展史看,没有一门学科因为缺乏或没有及时研究学科化问题而葬送了自己的前程,也没有一门学科是靠强力的学科化建设而跨入科学殿堂的。

其次,青年研究如何联系实际的问题。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首要的都不是如何严格遵循科学规范而使之成其为科学,而是它的存在价值或学术担当问题。社会科学成为社会科学,是由于它承担了自己的社会责任;人文科学成为人文科学,是由于它体现出自己的人文关怀。青年研究要肩负起这双重的任务,即对青年的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柏拉图早

就提出关于学术“对至善的本质形态加以观照”的问题。在前面我们也提出反对“科学家和学者的上帝”的观点,在肯定科学的相对独立性的同时强调科学与社会的互动性。在这里,我们着重于青年研究的社会责任(包括人文关怀)问题。

青年研究要联系实际,其首要的含义是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这虽然是一个非常之俗套的问题,但在关于青年研究的学科建设和发展的一些讨论中,流露出一种过分强调学术方面的倾向,所以提起这个问题也并非完全是多余的。实际上,我们以往在谈到理论(研究)联系实际时,更多的并非是在学术范畴来谈论这个问题,而是立足于对某些外在于学术的社会机制或社会力量所作出的一种非学术的社会性承诺。但这却常常造成人们的一种错觉,即学术的社会承当一定是来自于学术之外的不可抗力的制约和强求。以此推论的结果即是学术要自由、自主,就要摆脱这种如同梦魇般的“联系实际”的不可抗力,决不能“以研究对象的重要性替代学术研究的重要性、甚至以社会的经济的需求误作为学术评价的标准”,要“将中国的社会科学视作相对独立于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学术领域,通过科学资本的增加,以及与日常性常识的决裂,以增进和捍卫学术自主性”,并认为这“是中国社会科学得以发展的前提性条件”。这可谓是典型的以学术的名义对学术与社会、理论与实际的关系的一种非学术的、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野蛮肢解或误解。“为学术而学术”、“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等提法,在严格限定在个人学术和科学活动范围内的情况下是有意义的,它表现出个人的一种非功利性的学术献身精神和人生价值追求。在特殊的社会环境条件下,学者或科学家将其作为一种对来自外部“不可抗力”对学术的干扰和束缚的反抗策略或权宜之计,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在不加限定的情况下一般性地谈论“为学术而学术”的问题。“一小群专家在一个狭隘领域里获得的孤立认识没有任何价值。该认识惟有融入整个认识论理论体系,并在综合中对回答‘我们是谁?’这个问题真有裨益时,它才具有价值。”^⑩“为学术而学术”不可能成为青年研究学术发展的进路。

默顿作为社会学大师,他所关注的不是建构庞大的理论体系,而是努力探讨理论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的途径,“数密的分析技巧”与“精练的经验取向”是他的研究的基本特征。默顿注意到,“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之间的道路总是崎岖不平的”,一方面是“面对迫切的决策问题,社会学知识有时显得无关紧要或不切实际”,另一方面是“从社会研究到社会政策,有时并不为社会学家所看中,他们专业成功的衡量标准不在于解决了实际问题,而是看他们对关于社会如何运行的经验性和理论性知识的学术贡献。”^⑪他的许多学术研究活动即是致力于在社会研究和社会政策之间铺平道路,他本人也将实现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结合看作自己对社会学的贡献。检验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能否将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结合起来,对社会研究来说,没有经验证明的理论研究,和没有理论指导的经验研究,同样是没有意义的。而社会研究不能走进社会决策系统,或将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人为割裂开来,或自我陶醉于研究成果的孤芳自赏或学界评价之中,都将是研究者的一种悲哀。对青年研究来说,这点更值得特别予以重视。

理论联系实际在学术意义上还有一层重要的含义,即是联系本土的实际。可以夸张一点说,我们的社会研究完全是建立在国外的概念和范畴基础之上,尚未形成自己的话语系统。这种状况恐怕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改变的。目前我们所能够做到的是更多关注本土性问题,在运用现有的概念系统和方法的基础上对本土性问题作出科学的、合理的解读和阐释。这实际上也关涉学术责任的问题。青年研究首先是青年的,青年研究之所以能够作为一项学术研究事业而在社会上有一席之地,首先是青年的需要而非单纯为填补某一学科空

白。在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史上,梁启超为我们作出了榜样。梁启超作为中国现代史学之父,是因为他一开始就将新史学的逻辑起点建立在对民众“国民意识”的启蒙和塑造上,他用新史学告诉读者的是“人人皆以国民一分子之资格立于国中,又以人类一分子之资格立于世界”,新史学的目的首先不是取得史学界的认同而是实现人民关于民族国家身份的认同。梁启超是现代“中国少年”的第一个呼唤者,而他呼唤“中国少年”的真实目的是呼唤“少年中国”的觉醒和崛起。中国的青年研究,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学术自觉。

另外,坚持青年研究的开放性,坚持时代的与青年的、学术的相统一,是中国青年研究发展的必要原则。青年研究是一个综合研究领域,研究青年一来需要在各相关学科领域内进行,二来也需要借助多学科的概念、范畴和方法。无论从国外还是国内已取得的青年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来看,都是涉及到众多学科领域,既有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的,也有文艺学、政治学、经济学、人口学的,更有难辨其本来学科面貌的。对于这样一个综合研究领域,创设一个制度化的独立学科是否可能,需要慎重作出回答。进行这方面的探讨(在某种意义上)是必要的,但探讨的方向决不应该是使青年研究走向一个封闭的、独立自主的学科空间,成为一种以学科建设为名义进行的新的“学术圈地”,进而形成所谓的“科学而严密的整体结构”。青年研究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青年研究的学科化目标在于促进各学科对青年研究给予更多的关注和介入,它最终的学科形式是一种“集约化”的学科组合或类似研究学派的形成。“集约化”是经济学的概念,主要指在生产经营或经济活动中通过对诸如资金、设备、技术、人力资源等要素的提升、组合、集中、增加等方式实现最小投入下的最大效益,因此也称为内涵式增长或要素经营。在青年研究中借用这一概念,一是主张在现有学术资源背景和条件下,通过对研究力量、经费投入、行政组织以及研究方法、概念系统、学科规范等研究要素进行整合、提升、重组等改变,以尽快提高研究的质量和数量,二是避免青年研究在学科发展本身缺乏严密论证的情况下盲目步入学科建设的误区。同时这一思路也受到当代文化研究、批评理论、社会理论等理论研究发展模式的启发,这些研究都产生过或仍在产生相当广泛的影响,但从其发展过程和影响社会的方式看,并不在学科化方面,而主要是以新的研究取向和学术群体或流派的面目出现并为世人所接受的。^⑩具体说,青年研究的“集约化”发展模式,重点在三个要素的调整、配置和协调上。一是“学人”,主要指学术或学科带头人及其所带领的其他研究人员;二是“学科”,主要指青年研究相关学科及其研究方法、概念系统、学术评价系统、选题规划系统、成果发表系统等;三是“学院”,它可以是大学的院系,也可以是一般的学术研究机构,这些院(校)系和机构在行政、经费、课题等方面给予青年研究以协调、支持。“学院”既是青年研究“集约化”发展的载体,也是形成青年研究学术流派或学派的基地,对于青年研究实现集约式的规模化、集团化发展是不可缺少的要素。“学院”是青年研究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集约化”发展的根本希望之所在。简言之,“集约化”重在学术发展方面,重在现有学术资源或要素的利用方面,重在内涵增长和规模扩展方面,它可以是目前我国青年研究学科发展建设的权宜策略,也可以作为其长期发展战略来系统规划和组织实施。

青年之于社会的价值,是使社会恢复某种自然本性,是使社会充满生机和孕育新生命的一种力量,是真正实现人与自然、与社会和谐相处、走向进步的希望。因此,青年研究要对社会的变化(包括历史的和现实的)及其对青年的影响作出敏感的反应,既能够“站在社会变革的波涛汹涌之中,同时站在学术探讨的最前沿”,应是非常值得赞赏的研究态度。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青年之于社会,往往并非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与其说青年是社会变革大潮中的弄潮儿,毋宁说他们的生存状态永远是在社会剧烈变革或“现代性的旋涡”中挣扎、奋斗、反

抗和求索。青年研究的学术关注亦将永远是对青年这种生存状态的描述和阐释,而是否能够站在所谓的学术最前沿,亦即看学术对这种状况反应的敏感程度和说明力度。

青年研究的发展不能离开对有关青年及青年与社会的关系的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的回答,所谓的本体论问题、主体性问题、方法论问题,本身都不是什么玄奥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阐释和说明首先是回归到青年自身,回归到社会与青年的种种联系或关系之中,在青年的生活世界中去寻觅答案。青年研究的学科化或科学化进程,是一个自然的自我生成过程,并且是在一个开放的环境和状态下各相关学科共同努力的结果,而非某种单纯主观建构的产物。目前,需要付诸最大努力的仍是对某些基本概念或问题的作出合乎本土青年及我国青年研究实际的相对正确的理解,吸引相关学科和社会研究力量对青年研究的关注,走“集约化”发展的路子,使我国的青年研究能够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注:

- ①[英]彼得·伯克:《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修订重印版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 ②俞宣孟:《本体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作者认为,本体论是关于“是”的学问,其较适当的译名应为“是论”;用“本体论”译ontology不仅是牛头不对马嘴,而且容易使人望文生义,将其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本根”、“体用”等概念的论述相联系,从而勾勒出中国中国哲学的本体论理论框架;
- ③[法]埃德加·莫兰:《方法:思想与观念——生境、声明、习性与组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
- ④这里对“范式”的理解指一般的研究框架、视角以及对理论与研究所持的基本取向,它所提供的是观察事物的方式和关于事物真实本质特性的一些假设。参见[[美]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美]劳伦斯·纽曼:《社会研究方法——定性和定量的取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 ⑤[英]R.G.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9页;
- ⑥同一性或认同问题与科学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的冲击,被认为是当今世界最具普遍性的两大问题。埃里克森试图通过对同一性混乱和自我同一性的丧失来解释战后美国青少年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危机。在通常情况下,所谓的同一性或认同,指的是自我身份的确认或识别,即自我身份感的获得过程。但是,在实现自我认同过程中,社会对个人自我身份及其价值、意义的认可、肯定程度,亦即来自社会方面的自我身份认同,对个人实现自我认同会具有更重要的意义。然而这二者之间往往很难做到同步和协调,相反却充满矛盾和冲突,在青年当中这种情况表现更为突出;
- ⑦⑧[英]R.G.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72、第280页;
- ⑨在一般意义上说,我国青年史的研究也并非绝对没有,例如关于青年运动的研究就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也出版了一大批历史资料和专门著述。但是这种研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青年研究,而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一部分,因此在这一范围内的我国青年运动研究排除了中国共产党以及共青团组织所领导的青年运动之外的全部内容。近年来的一些专题研究开始进入青年史的领域,如关于早期学生运动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桑兵的《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学林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有马庚存著,红旗出版社2004年出版《中国近代青年史》,但影响不大;
- ⑩[法]埃德加·莫兰:《方法:天然之天性》扉页引薛定谔语,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 ⑪[美]罗伯特·K·默顿:《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3页;
- ⑫在方法论意义上,社会研究被认为有三大研究取向,即实证主义、诠释的和批判的社会科学。批判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取向,从马克思、弗洛伊德到阿多诺、马尔库塞形成自己的传统,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有关联。批判的社会科学依据自己对社会研究中一系列根本问题的回答,确立了在社会研究中的独特地位并产生巨大影响。(参见[美]劳伦斯·纽曼:《社会研究方法》)这里提及这一问题的目的是要说明,社会科学学科地位的确立最重要的是看它如何从自己的角度对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作出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回答。

作者单位 深圳青年学院

责任编辑 劳 逊